

## 第七章 监 门 微 启

### 越来越紧

每日整理参观笔记，编写、排练庆祝“七·一”的节目……虽然没有空闲，我依然坚持看报，了解反右情况。

右派分子诬蔑共产党的领导，说现在生活不如过去，大家很气愤，郭树人说：“胡说八道。叫他们到南满的鞍钢看看，到北满的长春汽车制造厂看看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一事无成。”然而大家对于参观回来释放的想法自消自灭了，希望落空了。有人焦躁不安，吵闹起来。4所56室刘衍智与王毅夫俩人在熄灯后大吵大闹，白科长到场也没能制止，真是不像样子。

我自己认为最近出不去，这一反右更没有希望了。如果右派不闹事也许有可能，右派在社会上捣乱与我们也有牵涉，会有人认为战犯放到社会上，会成为右派的预备队，因而绝不能放。共产党释放我们这些人不容易。

我对右派分子还有同情之处，开始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，这些右派就发起了议论，如果不叫大鸣大放，谁敢讲呀？右派分子这是

上了当，现在又反右，将来叫谁给共产党提意见？只能歌功颂德，隐恶扬善，坏话、批评的话绝对不能说？想一想，自己好说，如果在社会上遇见大鸣大放还不一样瞎说？也成了右派。没有出去就没有这些麻烦了。犯人有什么反动想法也不奇怪，因为没有改造好嘛。我的同情右派的想法，在当时只吞吞吐吐的暴露了一半，认为还是马马虎虎吧，暴露太多了，成了监内的“右派”，那就是斗争的对象。无事不找事。政府规定出来“犯人守则”，有十多项，第一条是服从政府人员的管教。守则拿到小组叫大家讨论，大家说我们是战犯应当遵守犯人守则，遵守犯人守则是我们认罪服法的具体表现。大家都从正面发言，可是心里都有一个想法：参观后不但不放，反而越来越紧，以后的事还要多。

我一想，有了犯人守则就不能随便了，一切都要遵照守则办事，违犯就是错误。看来这里也要往监狱犯人的制度上发展。

白科长召集学委会及生活组长开会，指示各号用不着的东西，如绳子、带子、小刀子、玻璃碴子等都要缴出来。这事传达以后，一些抵触思想就发生了，杨南邨问：“我们的桌子缴不缴出去？”段克文问：“钢笔尖也是铁器，缴不缴出去？”

我有一个小镊子，我一贯不刮脸，用这个镊子拔胡子。传达以后，我认为这个镊子是我用的东西，没有缴出去。刘荣第知道后，一定叫我缴出去，我说：“这是我用的东西，这个镊子从长春监狱带到吉林公安厅看守所、辽宁公安厅看守所，经过这么些机关都没有上缴，现在我还需要，我不缴！”

“不缴不行！这是制度。”

“传达不是说了嘛，用不着的东西缴出来，这个镊子我用！”

“这东西不是必要的。”

“这件事你报告白科长也不会叫我缴，就是你找我的麻烦！”

我与刘荣第闹成了僵局，我非常抵触。一方面对刘荣第，一方面对犯人守则。犯人生活就是不好过，想不到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。

刘荣第把这件事反映给金班长，刘荣第的意思是，像关梦龄这样不守制度应该批评，可是金班长没有找我，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反映的，我只好不理。

第二天，金班长找我，我心想没有别的事，一定是为了这个镊子，我已准备了许多理由，金班长很和蔼地问道：“你有一个镊子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有一个镊子。”

“这个镊子你需要，你就留着用吧，不必缴出来了。”

我一听，出乎意外，立刻一切抵触都消失了，什么理由也没有了。我又一考虑，感到自己不对，我马上说：“报告班长，我这个镊子说用也用，但不是必须用它不可，我与刘荣第闹别扭，是因为我不满意他的态度，现在班长既然这样说，这样照顾我，我不留了。”“你留下吧，我叫你留的，没有关系。”

一个20来岁的青年态度这样和蔼，处理问题这样大度，事情虽小却使我很受感动，从他身上体现出共产党的温暖，我站在金班长面前显得太渺小。我接着说：“政府这样照顾我，我更应当自觉，我现在认识到，我不应该留这个镊子。”

“那你把镊子缴出来，拔胡子怎么办？”

“我先缴给班长，我用的时候再向班长要。”

我的意思是能把镊子交给班长我的心就安了，所以我找到一条交给班长临时保管的理由。

“那也可以，使用的时候找我要。”

我回到屋里，把镊子拿出来，高高兴兴地交给了金班长。

王光复问我：“怎么的？受了批评了？”

“受了批评我就不这样了。”我把经过对王光复说了一遍。

王光复说：“共产党教育的青年真不简单，就这么一点事情，如果批评一顿，把镊子要出去，你还能不服从？可是那样做效果不好，他这么一处理，你也自觉了，事情也办了，你还感到政府很照顾我们。事情是一件，办的方法不同，效果也不一样。这个金班长，别看

他年轻，不慌不忙的办事挺稳当。”

这个班长叫金兴石，犯人对金班长印象最好。比如有一次他值班，周上凡是 3 所的总值日，他搞错了人数，金班长只看了周上凡一眼，并没有批评，周上凡脸便红了，马上对金班长检讨，金班长说：“以后注意，人数不要差了。”

周上凡以后对我说：“金班长不批评人，可是谁都尊敬他，因为他的态度感人。我就怕他，在他当班时特别小心，十分自觉，叫金班长费心那就太不对了。”

秋天进行草袋子生产，参加劳动的战犯，开始认为这是运动，因为政府人员就是这样说的，后来才知道这不是运动，而是劳动，于是在思想上就有了抵触，如尚传道说：“这样疲劳轰炸怎么能受得了！”

他这样说，受到了同犯的批评，因为他没有上过劳动改造这一课，他只在公安局看守所住单人房，犯人的事对他来说一点也不懂得，他想的是多看一些书，将来当研究员。半天学习，半天劳动，他就感到疲劳了。大多数犯人的劳动是好的，有一股干劲。我参加打绳，脱了光膀子干，我是为了锻炼身体，倒不全为生产草袋子，利用劳动机会，增强劳动观点。

国庆节时，政府组织所有的战犯到抚顺市观礼。观礼台仍设在抚顺车站，在主席台的右首预备了一些凳子，那是我们三百人的座位。坐在观礼台上观看大会游行。孩子们拿着鲜花，成年人举着红旗，五光十色，灿烂夺目。正在我们看游行的时候，我发觉我们后面来了三四个武装战士，我回头一看，是大会的警卫哨兵，他们知道我们是战犯，便过来看守我们来了，真不好看哪。就在这时金科长到了后面，小声地跟这几个战士说了一下，他们就走了。我一想，还是金科长懂得我们心理。政府不怕我们出事才叫我们来观礼的，这些年轻的战士不明白我们的情况，结果对我们产生了刺激。

观礼回来，大家发现一所的人不够数了，原来有五六十人，现在没有那么多了。演剧的那个高个子，变戏法的小个子，扮蒙古姑

娘的那个人，唱歌打拍子的那个戴眼镜的，一二十人不见了，是释放了吗？还是转监了？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这时露出了消息，在6月举行大规模参观的时候，他们这些人没有去，释放这一二十人的事还见了一所的墙报。我对释放这些人的看法是：这是一些小汉奸，不是大臣之流，在解放战争中没有罪恶，捕来押了几年表现还不错，从轻处理，予以释放。我认为不会转监，在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不会再转到一般监狱去劳改。真的到了监狱，这里的事传到刑事犯的耳朵里就不好了。

冬天举行了一次图片展览，通过“图展”认识国民党统治中国的罪恶，以及解放后，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。我是这个图展的解说员，这个图展由吕科长主持，由三所学委会主办。一切图片制妥之后，先做一次预演，由吕科长亲自听了一下，又加纠正了一些事情。比如画社会主义阵营的地图，用蓝墨水画的。吕科长问田文奎这是什么道理？田文奎说：“没有红墨水，才用蓝墨水画的。”像这样的事情，如果不及时纠正，就会出笑话，犯错误。

## 交罪种种

1958年春节过去不久，金科长召集3、4所犯人做动员报告，检查不认罪，怀疑政策的思想，进行互相帮助。由浅入深，步步深入。

开始几天，吕科长到各组窗前听同犯们的发言，然后召集学委会，批评学委没有把大家动员起来，发言没有声势，有气无力。于是学委会向各学习组长传达了批评意见，要求一定要把学习深入下去，并开展写大字报，互相批评。这样一来，运动开展起来了，相互提意见也逐渐的尖锐起来，从暴露思想进展到交罪，互相揭发罪行。这样一来，有的同犯受不了了，产生了抵触。比如我们小组给

黄炳寰提意见尖锐了一些，特别是刘荣第说黄炳寰交罪打埋伏，有罪不交！黄炳寰闹了情绪，在一天早饭时，黄炳寰对生活组长姜明文说：“老姜，现在我正式表明：我开始绝食！”黄炳寰果真不吃饭了，大家怎么劝他也不吃。我也劝了他几句。我认为黄炳寰绝食是十分愚蠢的，坚持下去是要吃亏的，这是吓唬政府，难道因黄炳寰绝食而停止交罪？或者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批评？不会的，他想得太简单了。

崔科员上午便把黄炳寰找去进行了教育，中午他便吃饭了，就像小孩似的，所以，吕科长说：“反动派的官越大，越愚蠢。”一点也不错。我们这些在国民党时期负责任的人，到了今天，丑态百出，不像个样子。

张国泰检举了陈旭东：“陈旭东对我说，南京解放他之所以没有走，是因为有潜伏任务。”

根据这个检举，辽宁队开大组会对陈旭东进行帮助与斗争。我这时进退两难，追陈旭东的潜伏组织吧，他不可能有。是毛人凤叫他留下来在南京潜伏吗？根本不可能。像陈旭东这样一个交际甚广，人人皆知的人物，怎么能做到潜伏活动呢？蓄意把这个潜伏工作弄垮，才可能派陈旭东潜伏。并且，陈旭东在军统里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特务，也不被戴笠与毛人凤所信赖，这一点不是军统内部的人是不会知道内情的。军统所以任用陈旭东，是因为他在东北的军界、政界，有很多人事关系。比如1945年底，把陈旭东派到东北，给文强当副手，实质是叫他为文强作向导，作开路先锋，给军统局拉磨。而东北特务的总负责不能交给他，因为不信任他。既然不信任，就不能叫他做潜伏。再说做潜伏工作也要有一套潜伏的布置，上下级的关系不能没有。既无电台，又无交通，有了情报交给谁呢？与什么人取得联络呢？这些都没有，这个潜伏怎么做呀？所以说他没有潜伏任务。

况且，如果陈旭东真有潜伏任务，他怎么可能对张国泰说呢？不会那样冒失，他既没有神经病，也没有喝醉了酒。张国泰检举他，

可能把他的话听错了，所以我认为张国泰这样检举是有问题的。可是我不能表示，只能跟大家一样帮助他，叫他交待组织、交潜伏名单。我不这样办又该怎么办呢？运动一开始，我给陈旭东当律师，那就成了运动的障碍物了。我只有叫他交这个交那个。我真是言不由衷，即便这样，大字报也不指名地批评了我，意思是说，与陈旭东很有来往的人在帮助陈旭东的时候表示冷淡，顾虑重重等等。我对此不予理睬，也不去申辩。辽宁队的大组会开了几次，陈旭东始终没有承认潜伏任务。有一次，崔科员亲自主持，陈旭东也没有承认。

5月底，4所战犯赵一雪检举了我们小组犯人赵广元在南京当汉奸处长的事；又，业杰强检举张国泰当参谋长召开军事会议的罪行。这么一检举赵广元原形毕露，他始终没有交待这个汉奸职务。他认为当反动派比当汉奸强。不仅赵广元有这种想法，我们都有这种想法。认为1所汉奸比我们坏，我们与1所汉奸在一起改造都有些抱委屈。因而赵广元在南京当汉奸的罪恶决心不交。可是这一次经过赵一雪的检举，不交不行了，他才交出来。

1958年6月，在交罪运动中辽宁队迁到了4所，仍由崔科员领导。

有一天，吕科长召集各学习组长开会，在启发战犯交罪时提到了我，吕科长说：“关梦龄有四五十条血债，在长春是军统特务重要分子，他什么罪恶都敢交，才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。你们不要顾虑，不交出来并不等于没有，只是说明顽固。”

交罪运动开始以来我没有什么顾虑，我的主要罪行已交了，并且判了刑，有了判词，我是很坦然的。我一方面对别人进行帮助，一方面我也补交了二百多条余罪（都是一般罪行）。

交罪运动使战犯有许多想法，大致是：要根据交的罪判刑，这种判刑是不公开的，判而不宣；再就是判刑之后可能迁到监狱去改造。还有的人认为，从前已进行了交罪，这次再交不是说明我过去不老实吗？再者，如果每次都把罪交完了，将来再号召交罪，不就没

有可交的了？所以有许多人不敢大胆的交罪，有许多顾虑。

在交罪检查中出了许多相声材料。周觉民在检查中大吹大擂，说他家在贵州是一个望族，多有钱、多阔绰，把他家说成是贵州的“周府”，这不是检查，是吹牛；北京队一个战犯路秀三说，在英国海德公园，可以对当政首领发表不同意见，这是最民主的国家，他自己受其影响有海德公园思想。这张大字报被武汉队肖步鹏看见，他也贴了一张大字报，说自己也有海德公园的思想。一问他什么叫海德公园思想？他说不知道，再一追问，他说：“我看路秀三那样写，我也那样写。”这不是笑话吗？我把这些事编成了一个相声。

交罪的问题更多，有的把小罪说大，有的把大罪说小，有的化整为零，有的罗列现象，有的看风使舵，有的采取关门主义。

把小罪说大：我打了农民，因为我这一打，农民病倒不能出工，给这家农民带来了许多损失，分析起来这件事的后果不堪设想；

把大罪说小：有人说这个毙命农民是我枪走火打死的，这是错伤，过失杀人；

化整为零：一件罪恶分成几条。比如枪杀了一个地工人员，他把它化为四条罪，搜集地工情报是一条罪，逮捕是一条罪，审讯地工人员是一条罪，杀革命者又是一条罪；

罗列现象：比如肖抱愚把在国民党贪污、吃空额也列为罪行，用他的话说：“我在国民党军队吃空额，不用担架兵。到各县要民伕做担架兵，这就是罪恶！”这个罪恶是抓民伕，搞贪污、吃空额……多罗列一些现象叫人知道他交罪多；

有人看风使舵：交一些似是而非的罪。比如带兵的战犯，交枪毙逃兵的罪，有人问：“枪毙逃兵是什么罪呀？”他说：“这个罪大了，被枪毙的是劳苦人民的子弟，用枪毙逃兵来巩固反动派的军队纪律，为反动派效忠，这不是一条严重的罪行吗？”这不是他的主要罪恶，他交这些罪的目的是看看风头再作道理；

有人采取关门主义：干脆说：“我的罪没有了，都交清了。”意思说，你们帮助我，我也没有了；

还有人无理取闹：谢代生交罪有一条是：“小时，我偷妈妈的钱，这是自幼不端，本质恶劣的证明。”

还有人利用交罪，粉饰自己：李介立交罪时说：“我在当团长时，驻防一个地方，我把这地方庙内的泥像都打倒了，这是罪行一条。”我对他说：“这也不是罪行啊，这是你不迷信，反封建，进步的表现哪！”“不，我把佛像打倒是不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，对人民有害处，这是罪行。”

赵广元交罪：“1925年，在沈阳当警察厅督察时，打了一个商人的耳光，是罪行一条。”

张国泰交罪：“1926年，我当团长时偷了老百姓一条床单。”

各式各样的情形都有。政府根据这些现象，进行了批评，端正交罪态度，并且在四所成立了一个交心室，由衣科员负责布置。交心室四周都是图片，屋内阴森森的，一进屋便毛骨悚然。图片是许多罪行画片，有割头的、有割女人乳房的、有活埋人的、有用火烧的、有用辣椒粉熏死的……每张画片都有具体人和具体罪行。画了一百幅左右，叫四所犯人分批到交心室去表示态度。另外，谁如果有罪不交，就把这个人拉到交心室，叫他跪下，对他斗争。

我们辽宁队也到这屋去表示态度，我一进屋便考虑，如果叫我交罪，我交不出来血债怎么办？想来想去只好胡编一套，反正我编的谁也查不出来。宁可胡编，也不能抗拒，宁可犯胡编的错误，也不能犯阻碍运动的错误。但是没有拉我出去我也就没犯这个错误。

辽宁队由崔科员领导，他也领导南京队的运动。6月底，交罪运动达到高潮。虽然有午睡，衣科员却仍然在午睡时间集合一些战犯开帮助会。这时的会都是斗争会，一发言就是大声喊叫，表示有声势。开这样的会，辽宁队的午睡睡不成了，南京队也没有人敢睡，都在准备材料或写大字报。高潮中发生了许多事情，南京队打了陈廷琪的耳光，是姚轻耘打的；贾斗奎被捆起来，是袁剑飞等人动手绑的，罚立正等事情也都出现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走廊摆着桌子，拉人上去交罪。被拉上去的是段

克文，他拒不交罪，又把他拉到交心室，叫他跪下交罪。这时刘荣第走到段克文跟前，打算劝说段克文交罪，结果斗争段克文的叶佛佑与陈庆斌误解了，以为刘荣第是去袒护段克文，便动手打了刘荣第，胳膊打破了，陈庆斌说：“段克文不交罪，你刘荣第去包庇，不打你这个落后分子，打谁？”

崔科员来了，他问了一下事情的经过，便叫刘荣第到医务室上药去了。上药回来，我看刘荣第的小褂撕破了好几块。我对南京队打人很不满意，不应当打刘荣第，这内中一定有缘故，是叶佛佑的意思吗？没有搞清楚。

在交罪当中，南京队的生活组长（南京队习惯称为行政组长）更换太多。比如今天肖桂国交了罪，衣科员便在肖桂国那号门口说：“你们这组生活组长由肖桂国担任！”原来的生活组长也不撤，如果再有人交罪好，又派了一个生活组长，达到一个组三个组长。真是少见的事情。交罪好坏用当生活组长来奖励，如果这一组都交得好，大家都当生活组长？那么谁来当组员？

有一个下午，衣科员叫 4 所的人每人画一张自己的罪行图，贴在墙报上。有的会画，有的不会画，但是叫画，怎能不画？结果画个乱七八糟，贴在墙报上也看不出来画的是些什么东西。我想，这一定是为了加深我们对罪恶的认识，才叫我们画的。然而画得不像，效果不好，达不到预期目的。

段克文抗拒交罪运动，来了个关门主义，政府给他戴上手铐，由黄看守长将他押出监号，战犯们鼓掌，表示政府处理得正确。

我们小组的黄炳寰被拉上 4 所走廊的桌子，他胡编了一些罪恶，回到小组便推翻了。后来辽宁队召开大组会，帮助他，他立正站在门口。有一个人说：“黄炳寰再不老实，叫他跪下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黄炳寰一个箭步跑到外面，径直朝后院大烟筒跑去……他在前边跑，欧阳午和尚传道在后面追，黄炳寰跑到大烟筒跟前，抓住了铁扶手，欧阳午赶紧用手把他的脚拉住，他上不去了，这时孟班长跑来了，他叫黄炳寰下来，黄炳寰不下来，但也不上去，最后，大家

一拉，把他拉了下来，这时黄炳寰说：“我的自来水笔呢？”大家赶紧帮他在地上找笔。我心想，这个家伙老是办这些丢人的事情。上次他绝食，这次又跳大烟筒，他是想死吗？不，他是吓唬政府，真想死，还要自来水笔干啥？

烟筒没有跳成，黄炳寰回到了监号。孟班长没有批评他，但气坏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黄炳寰把新袜子、新鞋穿好，坐在行李上静等枪毙。他认为这件事是在交罪运动中犯的必然要杀头。上班后，崔科员把黄炳寰找去教育了一番，黄炳寰回到小组两眼发直，精神不振，心中忐忑，不知他又在想什么？

段克文戴上铐子押在禁闭室反省。自1951年，我就与段克文在一起改造。他这个人我是知道的，他不会反省好的。这次关在禁闭室，经过崔科员个别对他教育，又叫他到辽宁队的大组会上交待问题。这天学委会、辽宁队的28个战犯都集中在4所59室。崔科员叫段克文发言。

段克文戴着铐子，面不改色，发言还是之乎者也指手划脚，什么罪也不交，满嘴是辩护的话。大家一听，都说他不老实，但又找不到要害。我知道崔科员也没有掌握段克文的材料，刘荣第知道一点还是我说的。会场被段克文控制了，都在听他夸夸其谈。这不成笑话！我站起来请示发言，我说：“段克文在这个运动中起了破坏作用，在这儿戴上手铐恐怕还是第一个人。如果不是太坏、太顽固也不至于如此。这一点，段克文首先应该认识到。段克文有没有罪可交呢？有罪可交，他在吉林伊通县当县长，成立保安队，在长春近郊枪毙老百姓，这内中还有血债。段克文对这件事，对这个罪恶没有很好交待。别人一提，他就来个关门主义，顽抗到底，再就是他在长春督察处寄押了一个人，寄押的这个人据督察处法官于文学检举是有八路嫌疑的人，后来这个人病死在看守所。这件事段克文也没有彻底交待。他说押的这个人是逃兵，可是参加审讯的于文学说不是逃兵，这是一个问题。”

“再就是往脸上擦‘雪花膏’。1945年于上海见了戴笠，戴笠叫

段克文回东北刺杀张学思。我认为这是段克文假造的。他认为戴笠已经死了，无人出来对证。表示他对张学思还有一点‘照顾’的意思，这不是假装进步吗？他说 1945 年 12 月戴笠在上海见他，那时戴笠不在上海，在北京，我每天都看见戴笠。再说，张学思的问题是军统局计划策反张学思，而不是刺杀。如果真的刺杀张学思，能派段克文吗？按段克文说，他与张学思是同学，这个关系能成为刺杀张学思的条件吗？况且段克文没干过外勤，对行动工作是外行。如果找人行刺，又不会布置。这样的情形戴笠派他去刺杀张学思谁能相信？这是不是在交罪运动中向政府邀功呢？”

我又问段克文：“你见过戴笠，那么戴笠穿什么衣服？什么样相貌？有什么特点？住的是什么房子？你说说叫大家听听！”

他说了半天都不对，陈旭东在旁边也笑了。因为段克文没见过戴笠，怎么想象也想不出来。戴笠留着大背头，铁青脸，大嘴，不喝茶，不吸烟，头发上抹许多油，经常不戴帽子，冬天穿藏青哔叽中山装，夏天有时穿绿呢子中山装，穿别的衣服较少。鼻子有病，经常用手帕擦拭。一口浙江话，走路快，这是戴笠的特点。没有与他接触过怎么能想象出来呢？段克文说戴笠从腰里掏纸烟吸，这就是胡扯了。段克文把见戴笠认为是光荣，居心何在？我说：“把假东西说成真的，那么真东西又说成假的，这就是问题。这样下去，这副铐子你就保持住了。”

接着陈旭东也发了言，同我的意思一致。但是，段克文坚持他见过戴笠，我一想这没有什么争论的必要。崔科员叫段克文再反省一下，把他送走了。过了几天，把手铐给他下了。许多问题他是以不变应万变，也过了关。

在交罪运动中，万厉患了大疮，小便都烂了，屋里味儿难闻，真怪，大绿豆蝇也不知从哪来的，那么多，把万厉都给包围了。郑明新给万厉洗衣服，收拾床铺，表现得不坏，很关心同犯。没有几天，万厉被送到市立医院去诊疗。我心想，政府真好，给我们治一切病，连花柳病都给治。像这样的病在家中也是讨厌的，在这里受到政府的

照顾，真是令人感动。

交罪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由于姚步烈诬蔑政府人员，有一些犯人非常气愤，把他打了。我心想，只要不打出伤就行，应该打，这个小子不可理喻。杨不平作反动诗，也被大家斗争了……在交罪运动中必须急风暴雨才能促使战犯认真对待，如果和风细雨有些罪恶就难以交出来。至于个别人由于思想不正确，动手打了人，这是同犯之间的事，这其中也有伪装进步而打人的。

到了7月初，3、4所战犯的罪恶基本交待清楚。我补交余罪202条，过去交罪102条，共304条，一齐抄写清楚，呈给了政府。

## 人人呈请处死

罪交完了，接着进入认罪阶段，这一阶段辽宁队的学习归衣科员领导。崔科员不管学习了，大概是筹办电机厂去了。

南京队在认罪阶段，一些人要求处死，赵玉林说：“过去我钻了政府的空子，判我15年有期徒刑。现在我认识到，自己罪大恶极，请求政府把我处死，以平民愤。”

衣科员叫我们辽宁队去听赵玉林的发言。赵玉林发完了言，衣科员对辽宁队说：“你们听听，人家是怎么认罪的。”并责令高青山发言。

高青山没说两句话就被南京队给制止了，说高青山不认罪。接着，衣科员召集辽宁队学委刘荣第、高青山及三个组的学习组长、生活组长谈认罪问题。只有欧阳午与尚传道两个人呈请枪毙，别人都没有这个请求。衣科员把没有请求枪毙的人撵出了会场，留下欧阳午与尚传道在那屋里继续漫谈。不一会儿，又到3所，把辽宁队的人重新召集在一起，再谈认罪。这次改由欧阳午主持会场，刘荣第与高青山在一旁坐着，俩人一声不吭。辽宁队的人谁也不知怎么

说才好。我只说：“我罪大恶极，判 15 年太轻，应当加重判处。”我没有请求处死。

第二天，写呈请处死的申请书，每人都要写，我也写了一份。这是谁的意思呢？是衣科员的意思？还是管教科的意思？如果多漫谈几天，战犯有这种认识可以，然而漫谈的时间不多，每人就写处死申请书，能处死吗？不可能。正因为知道死不了，这样写谁也不在乎。要从内心真正认识到我们这些人罪应处死，出于本心写这样的申请，那才是水到渠成。可是现在总有点勉强，思想工作做得太草率，争取时间完成任务就不免走过场。

辽宁队三个组配属在南京队里学习，辽宁队的学习组长、学委，在南京队都是组员。在衣科员的思想里，辽宁队是最落后的，只有南京队才是进步的。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，辽宁队归衣科员领导，成为后妈的孩子，南京队是亲生的孩子。刘荣第、高青山在崔科员领导时是最信任的两个学委，可是归衣科员领导之后，最烦的就是他们二人。于是先斗争刘荣第，说刘荣第没有写自传，叫辽宁队写大字报帮助他。刘荣第在 4 所 56 室学习，我也在那学习，陈庆斌是 56 室的学习组长。陈庆斌秉承衣科员的指示，斗争刘荣第，叫我先发言。我说什么呢？刘荣第没有什么缺点，我罗列了一些鸡毛蒜皮，说我包庇。我心中不痛快，一想，算了，落到后妈手里老实一点好，光棍不吃眼前亏。

刘荣第白天写检讨，夜间写自传。刘荣第嘴里不说什么，心里怎么想的我知道。我认为衣科员与崔科员在同一领导之下工作，为什么对战犯有两种态度呢？是衣科员左了呢？还是崔科员右了呢？我看衣科员处理问题有点左。

比如衣科员对战犯的态度有许多地方值得研究，有一次叫袁剑飞写一张大字报，袁剑飞写好了，请衣科员过目，衣科员一看，便给扔在了地上，大不满意，又一次叫王仲模统计战犯通信表，王仲模的字写得潦草，衣科员便把这个表撕得粉碎，扔了一地；李寓春交了罪，后来又写报告给政府，说他交的罪有一条是假的，衣科员

回答说：“谢谢吧！”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明白。

衣科员最好临时召集战犯开会，他到 4 所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每组来两个人到学委会！”

一个组派出两个代表到了学委会，大家不知什么事。衣科员先说了，大意是，有的人思想很成问题，对蒋美还有留恋，“你们挖一挖，这是什么思想根源支配的？”首先刘衍智发言：“我就有幻想蒋美思想，这是我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支配的。我是极顽固的战犯，科员不指出来，我是绝对不说的，科员今天指出来，是对我的教育，我一定要……”下了一些保证就收场了。

再过两天，又开了一个会。衣科员说，有一些人讨厌学习，不愿学习。这么好的环境不好好学习，将来怎么做人？这些人厌恶新东西，说明还没有接受改造。问谁发言，刘衍智又站了起来：“我就有这种厌恶学习的思想，一学习就瞌睡，有这样好的环境不好好学习，这是对不起朝夕教导我们的政府人员，我今后一定要……”又下了一些保证。南京队有一些人，如赵一雪、徐照明、杨南邨、樊迅等人都会赶浪头，只要衣科员提出一种错误思想，马上就有人站起来承认，并且把自己大骂一顿。类似这样的会事先无准备，当场现发言，我认为效率不高，有时起好作用，有时起副作用。

衣科员办事性子急，遇事乐于立即作决定，比如张林生当学委的事，怎样决定的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因为上山劳动，张林生很能干活，就叫他当了学委。但是张林生这个人并不是很适合作学委的，说话随便，随意打人，都产生过不良影响。

1958 年的交罪运动成绩是肯定的，因为不交罪，就谈不到认罪；不认罪，又怎么能谈到安心改造呢？如果说后来我们改造有成绩，那就是这次交罪运动奠定了改造的基础。

回想一下交罪之前，南京队有一些战犯认为：“我犯的是公罪，是国民党整体的问题，我自己没有什么罪。我被俘，迁到这里总感到有点那个……”就是说，叫他改造冤枉了他。他的罪是国民党的问题，不是他个人问题，不认罪。可是经过交罪和认罪之后，都转变

了：“我们这些人都是人民的罪人，我们这些战犯杀了几十万人，有的是直接的，有的是间接的。不论怎样我们都是蒋介石的忠实工具，没有我们这些人蒋介石一个人就反动不起来。所以我们应当认罪，应当感谢共产党对我们的宽大，感谢人民政府对我们的不杀之恩。”如像赵玉林“请求处死”的发言便是感恩的心理的一种表示。

交了罪，认了罪，感到没有包袱，轻松愉快了，在这改造也心安理得了，不平不满的想法克服了。

这与管理所首长的正确领导分不开，与衣科员的苦口婆心的教育也分不开。在成绩当中，也避免不了有缺点。有一些我认为是缺点，也不一定就是缺点。在我与衣科员接触当中，我感到他也有优点。办事直爽，快刀斩乱麻。他对我从来没有批评过，还多次在会上表扬我，表扬我打草绳打得快，交罪交得好，热心搞文娱等等，对我鼓励很大。

崔科员是否右呢？他领导我们的时候对我们不多批评，或不批评，形成“迁就”我们，也许他强调我们自觉，可是我们有一些人却不能体会到这一点，所以，黄鹤说：“崔科员还没说‘不’呢，你就说了！”再就是对刘荣第与高青山等人过于信任，比如 1957 年冬评奖，辽宁队郭树人得一等奖，得了一支自来水笔，是不是郭树人比别人都好呢？不见得。就因为郭树人在帮助尚传道时肯破除情面，大胆直言，替高青山说话，因此刘荣第就说郭树人如何了，而得了奖。后来有人说怪话，郭树人又要退奖，受到了白科长的批评，这些事属于偏听偏信。

一切又恢复正常了。在交罪运动的两个多月里，没看电影，停止了一切文娱活动。有一天，秦班长叫我到院中去搬东西，我一看是部新机器。我问：“这机器新买的？”

“可不是，新电影放映机，五千多元呢。”秦班长说。

我从这部放映机看出来，我们在这改造还有一个很长的时间。日本战犯在这的时候，有那么多人却没有买这么好的机器，我们来了就买这部机器，看起来来日方长啊。

## 大家所关心的

这时候大跃进开始了，“一天等于二十年”的口号提出来了，展开了敢想敢干的活动，新的发明创造如雨后春笋。为了配合我们学习，政府组织我们参观“超英馆”。我们在大墙里边不知道社会上这样敢想敢干，一座大楼二十几天就盖好了；有许多产品超过了英国；连抚顺市一些中学都有发明创造；工人开动脑筋找窍门，都在大跃进。我们看到了许多实物，非常惊异，怎么干得这么快？真了不起呀！一个抚顺就这样，全国加在一起，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跃进。参观回来，大家谈论得十分兴奋。

10月，政府又组织我们到东陵辽宁农业展览馆参观。在这里看到了许多农业上的成就，有一些是大跃进的产物，特别是农业机械有很大的发展。在改造中需要一点一点地往脑袋里装新东西，天长日久装多了，就能把旧的东西挤出去。但不会一下子装满，说不定哪件事能装进去，这要看个人具体情况。比如在参观前有的南方人认为东北没有水果，如果有也较少，可是经过参观他才知道东北辽宁的苹果是中国苹果的主要产区，用这些苹果可以与苏联换钢材。于是，对东北的看法有了转变，进而认识到我们国家幅员辽阔，地大物博，值得骄傲。

11月，战犯管理所成立电机厂，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，我有两种想法：第一，成立电机厂就不可能轻易取消，我们参加劳动不会是短期的。显而易见要在这长期改造下去，心里感到这不是好事情；第二，成立电机厂，我可以学一些技术，将来可以自食其力。俗话说：“艺多不压身”，有技术到哪儿也可以谋生。两种想法，后者战胜了前者，学习技术的想法占了主导。

没有几天，就调我们十几个人到电机厂。我被分配学钳工。开

始，吴师傅认为我年轻，对我抱很大希望，我也下定了决心。可是后来，吴师傅对我失望了，我对他也失望了。他在钳工组呆不住，一天也不与我们说一句话，这样怎么学技术呢？学不了。维持现状吧。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，也不往深里追求了。一个礼拜天，我们被提出去，给大车床安天轴。这时吕科长来了，旁边还有关师傅、赵师傅等人。吕科长问我：“关梦龄，几个月能把钳工学会吧？”

我没有回答，因为在师傅面前，我如果说能学会，师傅一定不满意。我笑了一下说：“我一定好好学。”吕科长走后，赵师傅说：“几个月把钳工学会，那就没有技术了。”关师傅笑了一笑，我心里知道，他们都不同意吕科长的这种说法。我也知道，学技术不容易。

我们又学习了有关人民公社，大跃进的文件材料。农科员很认真地领导这次学习，还不时地进行测验，贴出了许多大跃进的剪报：钢超过了英国，稻子丰收，工业创新纪录……这些材料贴出来叫我们知道大跃进，人民公社这是当前的两件大事，加上总路线就是三面红旗。在这三面旗的指引下，我们可以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。

尽管处于大跃进时期，我们战犯还是希望出去之后作新闻记者、教员、研究员或从事其它脑力劳动，没有想到将来从事体力劳动，我对李衍涛说：“我们出去政府绝不会叫我们种地。如果去种地，花这么大的本钱改造我们干什么？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脑力劳动，最好是做一些与解放台湾有关的工作。”这是我的想法，但是具体做什么工作我也没想好。将来的事情在我脑袋里模糊一片，眼前想的不是将来做什么工作，而是什么时候出去。

战犯谈天都谈些什么呢？第一是谈过去的旧人旧事；第二是谈现在的改造情况；第三是目前的生活。

谈过去，一方面谈解放前的旧人旧事，津津乐道：这个在北京呢，那个逃到香港去了；他的老婆很漂亮，我与他们打过牌……对于过去的腐朽堕落生活依然留恋。有些人谈得太多了，感到被人反映上去不太好，便在话尾又加上几句批判词儿：“回想起这些事真

是罪恶，太不应当。我们花天酒地一席饭，老百姓需要积攒好几年，过去哪认识这些呢。”

也有谈过去的改造处所，如“我们1950年在山东解训团时，每天发水果，顿顿是鸡鸭鱼肉，那个时候菜吃不完，毛巾、鞋，月月发，不要都不行。”意思是这里不如山东解训团好。

谈现在改造的情况，感到生活制度太罗嗦，菜多吃不了，每天劳动的时间有点少，哪个班长好批评人，哪个科员批评了谁，哪个班长是朝鲜人，哪个犯人很顽固，出了什么笑话……

谈目前的生活，东北只用大锅煮菜，东北冬天吃不到青菜，接着就开“口头宴会”，说用白菜、青萝卜、大辣椒、豇豆可以做泡菜，能下饭，由泡菜扯到油菜，油菜如果用大海米烧好吃。这样一扯大家都参加进来了。

战犯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一是出监问题；二是家庭问题；三是现状问题。个别例外，另当别论。

出监问题是战犯首要考虑的问题，什么时候出监呢？如何才能出监呢？这是朝思暮想最为关心的大事，肖抱愚曾说：“我只问耕耘，不求收获，我只安心改造，别的什么我也不想，放不放那是政府的问题。”这样说不是心里话，大家也不同意他这种违心之论。

其次是关心家庭问题，对老婆孩子特别关心。老婆离婚了没有？孩子上学了没有？就业了没有？如果从家庭得到鼓励是一件大好事。比如陈达老婆在长沙医院当护士，四个儿子都能参加农业劳动，去年收入很多，买了自行车，给陈达邮来了罐头和葡萄糖，对陈达的鼓励很大。年龄大的战犯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。政府对这个问题也给予了关心。张禹斌的家早就没有信了，他也认为找不到了，崔科员对张禹斌说：“政府可以帮助你寻找亲人。”过了一些日子，崔科员通知他，找到了！那年他父亲90岁，知道儿子尚在抚顺，心中感到莫大的安慰，告诉张禹斌要好好改造，张禹斌掉下眼泪，感激地说：“我90岁的父亲还健在，我一定好好改造，争取回家看看老父亲。”张禹斌不但找到了爸爸，也找到了弟弟和女儿，这样

一来，张禹诚的精神愉快了。女儿又到这儿会见，送东西，写信，大大鼓励了他的改造情绪。

再次是关心现状，既不很快出监，家中又无亲人，只好希望现状好一些。对伙食特别关心，白菜能做出多少种花样？白面能做出几样食品？这很重要，不但关系到战犯的健康，也关系到战犯的情绪。战犯在口头上不说，或不敢说，但并不是心中不存在这个问题。不是有没有的问题，是说不说的问题。比如夏天，搞一点辣椒，拌一点黄瓜，吃得就兴高采烈。由头一年秋天到第二年“五·一”，每天是白菜煮海带，有人说了：“在东北吃菜没有办法，没有别的菜，白菜一吃就是半年，棉袄一穿就是七个月，嗨，白水煮白菜，这就是东北的吃法。”因为吃的问题挨了批评，到生活检讨会上，每个人都能发表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论，似乎是很认罪的。比如说吃海带的问题，樊迅说：“海带到我们南方，用它做席，是最宝贵的食品。政府给我们买这样的菜吃，真可以说太照顾我们了，我为什么不爱吃呢？因为我一吃海带肚子疼，不消化，医生知道。”别人虽不这样发言，但是也有一套对待办法。先说海带大量的吃是政府的照顾，我愿意吃海带，真到分菜的时候，勺子一点，把菜碗拿走了，就是这样对待这些问题。说是说，做是做，二者根本没有联系。厨房来了什么东西？礼拜日吃什么？也都是战犯所关心的。

其他关心的是，看电影、洗澡、发日用品，特别发纸烟，对于吸烟的人更是重要。

除了关心这些问题，还有一些改造比较好的战犯，关心国家政治生活。比如生产建设，对外政策方针。有一些关心国际问题是从反面来看待，希望天下大乱，别有用心。

不能出监，只能关心眼前。有病就看，闲话不说，无事在床上一坐，低头一想，就算一天。这种情况不是全都如此，但为数不少。

1959年春天，经过调整监号把辽宁队并入4所，把北京队并入3所。在电机厂劳动分为两班，4所甲班，3所乙班，上下午分班干活，队的称呼无形中取消了。我被调到4所56室，这屋是钳工

组，小炉，安装的人也在这儿。各监号的人数差不多，基本上是按工种调整的。这样劳动、学习比较方便。

夏天，白科长领我们4所犯人到将军堡去开荒。第一天我们徒手空拳把山上的草拔了，有了立脚的地点，然后开路，继续拔草。第二天，我们又去修路，修猪圈，盖三间小房子，一样一样的建设起来。大家力量虽然不大，但干得挺有劲。这是因为金所长（即从前的金科长）、白科长带头劳动，大家精神十分振奋。我们有些人背后说：“这不是劳动，这是运动，到山上逛逛，与我们的身体有好处，这里的空气新鲜。”一边劳动一边说笑，思想上很开朗。但我有不同想法，又到电机厂、又上山，又是工、又是农，不知哪一方面重要？我愿意在电机厂多学一点技术。我把上山，只看作锻炼身体，从不考虑生产问题，认为我们的一切都由政府供应，不需要我们自己生产粮菜。

在机关西边种了一些稻田，由金所长带领打了一口井，准备浇稻田用，但是水少，不够用，这口井花了很多劳动力，加了很多夜班。金所长的看法是“重要的是锻炼锻炼，养成劳动习惯。”

我们劳动在电机厂，在稻田，每天常换劳动岗位，也颇有意思。不过我总想在电机厂学技术，修理也好，装配也好，把技术学到手，将来在社会上可以自食其力，心安理得。我对劳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看到产品有自己的劳动感到特别欣慰。在我们的稻田中间立着一根电线杆，这个电线杆被挖走时，把稻子踩倒了一片，我看后心中很不好过。这才体会到行军打仗把农民的田地给糟蹋了，农民心里的难受滋味儿。

6月，刘荣第和李仲章被释放。当时，没有人敢谈论这件事。我知道这是刑满释放。刘荣第是1951年6月在北京被捕，判刑10年，由逮捕之日起，中间因为检举揭发有功，给他减刑两年，到1959年6月正好8年，到期释放。我是15年，还有4年，现在谈不到这个问题。不过我想，除了刑满释放，没有别的方法释放战犯吗？我想会有的。可是没有先例呀！回所背后议论：“判刑的可以等到

刑满释放,没判刑的等什么呢?”“等大赦呀!”“什么时候有大赦?”“什么时候颁布,什么时候有。”

出监是战犯最关心的,加刑是战犯最担心的。万厉住院治花柳病期间,乘班长不注意,拉拢一个小青年,他对这个青年吹了许多牛皮,把管理所的一些人犯也泄露出去了,他对这个小青年说:“我将来出去给你找工作不成问题,我认识的人多了,我们管理所有溥仪,都是大官。”这个青年认他为义父,给他买了许多东西,内中有日记本。他把日记本带回来才犯了事,他问我:“你看我这个事能不能加刑?”

我吓唬他一下:“你这是现行反革命活动,在监中继续犯罪,一般的说要加刑二年;你把管理所的人犯都泄漏了,这一项就是一年,加在一块,加刑三年。如果坦白得好,也可能从轻处理。你这件事严重得很,我都替你害怕!你患这样的病,政府送你住医院,这是天高地厚的恩情,你来了这么一手,给管理所找了麻烦。看守的班长也因为这件事要受批评,你连累了这么多人,于心何忍?”

“那我怎么办呢?”

“先写检讨承认错误,把这件错误从头到尾好好坦白,再挖挖思想,为什么到医院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?”

“我写不好,你给我写吧。”

“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写,你怎么做的就怎么写,我不能替你写。”

万厉这件事,在监狱一定要加刑,但是在战犯管理所就不一定了。

## 帝封官同堂谈罪

7月,彻底打扫卫生。各监号把墙壁上的灰尘用铁片刮下来,

顶棚上的积垢也要扫除干净，然后重新粉刷。俱乐部扩大，修上了电影放映室。院子铺上石子甬道，这些措施我认为是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。又一想，这样大的整修，证明这个地方要长久地存在下去。我们也要在这长期改造。不能如此深想，否则没有情绪。我学会了从日常生活中培养乐趣。白科长叫我们修院子的甬道，把大俱乐部后面铺成石子路。我们到永安桥的河里捞石子，由4所和3所战犯在院子里铺路。甬道需要铺出花纹，美术化。我既参加铺路，也参加捞石子。我特别喜欢捞石子，可以到河里洗洗脚，洗洗背，感到好玩。幼年时，我常到河里去游泳，现在又下到河里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趣味儿。

8月，举行了一次大组会。1所、3所、4所、7所的战犯都参加了一帝、封、官三大战犯在一起举行罪恶漫谈会。

7所日本战犯古海忠之先做报告，他讲日本话，由一所战犯溥仪的弟弟溥杰翻译。古海忠之是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，他叙述了在东北所犯的罪行，认识得很深刻。我一边听一边想，能把日本战犯改造好，很不简单，只有共产党才有这样的能力，只有共产党才有这样伟大的抱负。国民党把岗村宁次弄了去，指使岗村宁次仍然作战犯活动，继续危害中国人民，共产党把这些日本战犯改造好，去从事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活动。两者对比，就知道国民党的反动性了。共产党能够改造日本战犯、汉奸和国民党战犯，这种伟大的创举古今中外是没有的，我们从内心钦佩共产党。

古海忠之报告完，溥仪报告。伪满的皇帝颇吸引人，我以好奇的心情对待这位清朝末代的皇帝。溥仪一口北京话，报告的内容很丰富，暴露的思想很具体，很实在，认识罪恶也很深刻。没听溥仪报告之前，认为他学习得不会好，可是听过他的报告，打破了我的主观想象。能把溥仪改造到这种程度，由他亲口说出认罪的话，真是共产党改造人类、改造战犯的卓著成绩。改造皇帝可以说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——过去没有人改造皇帝，今后呢？没有皇帝便用不着改造了。

第二天继续开大会，在施锦的发言中，说到他在中统当特务，负责看守所时，如何把廖承志的手表勒索来，如何残害进步人士等罪恶时，声泪俱下，给大家很大的教育。

这三类战犯所犯的罪行是严重的。日本战犯古海忠之与日本首相岸信介同过事，古海忠之到东北负责经济部门工作，把东北的矿山等资源开发给日本。不仅如此，作为东北的太上皇操纵一切，他成为仅次于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的第二号日本战犯。溥仪及一些汉奸大臣是伪满第一等战犯，再就是我们这些人，是蒋帮的骨干分子。从以上这三类战犯作的典型发言，控诉的罪行可以知道，战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。

这个大组会开了三天，对我们起了教育作用，大家说：“日本战犯和溥仪改造得比我们好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。”“他们改造的时间比我们长，他们在1945年就押到苏联去了，比我们多了四年呢！”

我心想，我们3、4所战犯固然有改造好的，但能比得上溥仪的不多，不用说报告的罪恶，就是对罪恶的认识，我们还相差很远。

战犯在报告中也出现一些小小的失误，这主要发生在我们国民党战犯里。在张整军的报告中，他用了“以德报怨”和“以怨报德”，这两句话他常常颠倒，如说我们过去犯了大的罪，今天共产党对待我们还这样好，真是“以怨报德”，大家说：“说错了！”他马上改了过来，以后他又这样说了，台下大喊：“胡说！”我认为类似这样的成语，如果弄不清最好少用，如果差了就差一百八十度，相差太远。我在自首后，写材料也好在文字上推敲，用四六对句，后来政府人员对我说：“不用这样考虑词句，你想说的话用最通俗的话说出来就行了，大家能明白就可以，不必引用一些成语，否则不恰当更麻烦。”因此，我以后写材料，便不在文字上多加考虑了。我们这些战犯，有人写东西总是想卖弄一手，在文字上过于修饰，有时因词害义，便出了问题。张整军就是一个例子。

报告会之后，来了许多摄影记者，并且住在这里，每天拍摄不停。院内的一切情况，特别是溥仪的活动，都照了相。后来又到电

机厂去拍摄，给车工组肖桂国、安装组高青山，各拍了劳动相片（也许是拍电影镜头）。于是大家猜测，这是为了特赦作准备。

院中，许多女工刷油漆，大俱乐部焕然一新。这时候我们正准备迎接“十·一”的节目，有一些小节目在大俱乐部预演，晚上那些摄影记者都来观看。后来我们京剧组一研究，一些小节目被外人看见不一定会有好感，我们应该演一个比较有把握的京剧给外宾看看。经崔科员同意，排演了《辕门斩子》，在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演出了。观众还是这些摄影记者，他们评论很好，说我们的文娱生活还是很不坏的。文娱演出，代表了我们改造的气氛。

战犯们的思想多数不安定，我认为在国庆节会举行特赦大会，来一个庆祝建国十年，外加欢呼特赦，喜上加喜。与我一样想的大有人在。这个说：“这回能放出去百分之八十，所剩无几了。”那个说：“都放出去，这个电机厂就归北院<sup>①</sup>了。”还有的说：“剩下一些人，到明年国庆节也会一扫光。”有人对我说：“你一点问题也没有，已超过十年了，在改造中又不坏，这回十拿九稳！”三所乙班钳工组的全体战犯对于我的特赦一致同意，他们的理由：第一，是自首；第二，改造中表现好；第三，写材料多；第四，交罪好；第五，靠近政府；第六，文娱搞得。我听到这些话心里甜滋滋的，认为这些人看问题实事求是，很全面。我自己也这样估计。其他有谁，有多少，我不考虑，反正我是必然有的。

这时，战犯的思想言论都围绕着特赦问题：看见来了几部汽车，大家也纷纷议论，一定是上级来人筹办特赦来了；叫我们到大街上垫垫马路，也认为与特赦有关……风吹草动，一切事物都与特赦联系起来，闹得人心浮动，坐卧不安。

我静下心来想了想：特赦之后我到哪去呢？老婆没有信，据判断她在1957年还未嫁人，1959年就嫁人了？不会的。如果没嫁人，那就没有问题，如果她嫁了人，我就回北京。有了工作，找老婆是不成问题的。小孩子怎么办？把她接到北京？或仍叫她在徐州？想来想去没有结论。这些事等出去之后再说吧，好办。

国庆节前夕，照样演出文娱节目，改善生活。三天过去了，国庆节没有特赦，我失望了。我想，也许还没准备好。十多年都等了，晚几天就等不了？自己又想，这不是小事，要经过中央才能决定，不能够草率从事，等着吧。

## 是非是能够分辨的

有一天，黄鹤负责维护露天舞台的栏杆及四周的墙基。这个舞台是日本战犯修的，现在坏了，要重修，再刷一刷漆。在维修过程中，刘协理员来了，对黄鹤的搞法不同意，叫他改，黄鹤坚持不改。刘协理员走了。黄鹤不服从政府人员，真成问题，但他对我说：“谁说的不对，我也不服从！”

我批评他：“你个性太强了！”

他不屑一顾地说：“你不用管这些事！”

1958年的夏天，我们去人到7所盖鸡棚子，当时黄看守长叫把立柱斜架在墙上，架好之后，刘协理员对黄看守长说：“立柱不直立没有劲。”第二天就返工了。由黄鹤的这件事，联想到盖鸡棚子，黄看守长都能接受的意见，战犯黄鹤却不能接受。这说明我们改造差得太远。这是政府人员对战犯的另一种态度，启发自觉，但也有另一种人员。

我们不少人都怕孟班长，只要孟班长一上班，应该请求办的事情，也要拖到他下班之后再办，实在没有办法才向他请求。向孟班长请求事要小心谨慎，把要说的话事先准备好，走到孟班长前面一定的距离，站好，“报告班长！我们请求到大俱乐部排戏。”孟班长低着头，看也不看一眼，半天不做答复。我心想，排戏是搞文娱，又不是我个人的事，受这样的气真是难过。等我把请求再重复一遍，他才把脑袋一抬，用一种斥责的口气说：“去吧！”这样做使我心寒，我

这是为什么？难道我不作京剧的剧务，就不能改造吗？

3所犯人吕震寰骂人，有人反映给孟班长，孟班长把吕震寰找去，进行严厉的批评，吕震寰不服。

“你为什么骂人？”

“我没有改造好。”

“为什么没改造好。”

“我反动思想严重。”

孟班长有来言，吕震寰有去语，各不相让。孟班长坐在把门的座位上，吕震寰站在他对面，有一些同犯在偷看。结果，孟班长对吕震寰只是喊了一阵，什么作用也没起。吕震寰回去之后气得够呛，孟班长也气得够呛。

这位孟班长为什么总是没有好脸呢？从他的表情我们体会不到温暖，提起孟班长就想到发脾气，批评人。拿批评吕振寰来说，当然吕震寰是不对的，不听政府人员管教，《犯人守则》第一条就不允许。但是又一想，对吕震寰是不是没有办法改造呢？共产党能改造人类，包括战犯在内，难道说把吕震寰除外？改造吕震寰是没有问题的，在方法上如果注意一些，效果也可能好一些。如果把吕震寰找到屋里，避开同犯，稍微讲究一下态度，吕震寰是不会抗拒的，可是在走廊里批评他便适得其反，吕震寰一想：这是故意叫我丢人，好，吵就吵，闹就闹，反正就这么大个事，我就不服你！结果成了僵局。

过了几天，白科长在大俱乐部给3、4所战犯讲话。谈到生活问题，白科长说：“有人大吵大闹，别看你的刑期不长，如果这样下去也不见得好。”我知道这是指吕震寰。

这使我想起我曾出过力的一部反特电影《无形的战线》，内中审讯特务有一个拍桌子的镜头，据说周总理看后要求修改。这说明了共产党主张什么，反对什么。

当然孟班长也有许多优点，办事认真，就是对管理所的同志也照章办事。比如锅炉房王师傅在一个礼拜天到监房提人干活，因为

没有办公室的条子，被孟班长拒绝了。战犯看问题，虽然离不开自身的角度，但是毕竟经过政府十多年的教育，一般的是非是能够分辨的。如果多数战犯都有相同的看法，那也是值得考虑的。

10月中旬，我们4所的战犯到人民公社去收白菜、萝卜。这个劳动大家都愿意参加。我们自己带粮，还可以在那买地瓜吃。有一回地瓜煮多了，吃不完拿着在路上吃，很有生活情趣。还有一天，收菜回来晚了，天黑看不清路，到了大岭，对面来了一辆汽车，大家说：“如果汽车来接咱们，那有多好。”“你们总想好事。”有人反驳。

汽车越走越近，车灯照得眼睛睁不开，走到跟前，汽车停下来。我们一看，是咱们的汽车！金所长从车上跳了下来，对我们说：“我知道你们走黑路不行，就用车来接你们，快上车吧！”大家嘻嘻哈哈上了汽车，我上的拖车，金所长也上的拖车，我们说：“所长坐前边吧。”

“我来的时候就坐在这儿，大家赶紧坐好吧！”

汽车开了，金所长就与我们漫谈起来：金所长这个人很随便，又很温暖。小的时候，出门回来晚了，做老人的不放心，总要站在大门前张望。现在做了战犯，政府还能这样关怀我们，能不叫人感动吗？大家一致说：“像金所长这样对待我们，就是石头心也能感化。”

白科长对战犯十分照顾，他领我们出门就像阿姨带孩子一样。告诉队伍前边慢点走，年龄大的别跌倒，就这样一边走一边说。我有时候嫌白科长太罗嗦，难道我们还不会走路吗？以后才体会到，这是照顾我们。上中学的时候，我搬到学校里去住，离家的时候，父亲告诉我，不要喝凉水，少吃零嘴，晚上睡觉不要凉了肚子……我感到特别絮烦。现在回忆起来这些旧事，感到政府人员对我们的照顾和在家一样，有的甚至比在家还好。

有人向白科长反映，一些年龄大的战犯就爱吃有肉的菜，没有肉的菜吃得很少。白科长听了，笑一笑说：“好的嘛，谁不愿意吃？年龄大的人喜欢吃，就叫他们多吃一点，不喜欢吃，就少吃一些，这方面要照顾他们。”白科长这样一说，给大家一个教育，3所犯人都

说：“我们因为吃菜闹意见真是不应该，谁若多吃一些，就多吃一些，有什么了不起，今后不要再给政府添麻烦了。”吃菜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

我们养了一些猪，打算找一些白菜帮子做饲料。王科长、崔科员领我们七八个人出发了，另一组由白科长、衣科员率领到了山后的生产队，人家说白菜帮子自家留着喂猪，不叫我们拣。我们坐在生产队大门前休息，王科长去联系。中午，金所长坐着小吉普给我们送饭来了，一桶大米饭，一些咸菜。在哪吃呢？在生产队的门口？崔科员说：“咱们上山吃去。”我们提着饭，爬到对面一个山坳里，王科长与我们一块吃，说说笑笑，怪有意思。王科长作风也很平易近人，说话也不做作，与他谈话不拘束，也不必考虑自己的言语是否得体，所以，午饭吃得很痛快。吃完了饭，我们有几个人凑在一起开小会，有人问：“咱们为什么上山里来吃饭？”有人回答：“这个地方空气好，干净。”

我说：“这是涉及我们战犯的待遇问题。你们想，我们来这么些人，什么也不干，在生产队休息了一阵，汽车就把大米饭送来了。如果在生产队门前吃，围上一群小孩，势必暴露我们的身份。知道我们是一群战犯，又受这样的照顾，人民会有意见。所以拿到山里来吃，缩小影响。”

“对，关梦龄体会得对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的生活水平超过了普通老百姓。”

11月初，我们由金所长率领，到距此有20里的马三家子生产大队帮助植树。大家很卖力气，干部也动手干，效率很高。中午在那吃饭，这一餐饭吃得大家十分欢喜。老豆腐，落花生，随便吃不限量，这是东北人待客的习惯。大米又白又有油性，一些战犯从没有与东北人民接触过，这一顿饭把他们吃服了。东北人民的生活这么丰富，东北人这么大方。日本战犯第二天也去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又给我们发了花生。7所崔科员用日本话告诉日本战犯，这些花生是生产大队赠送的，日本战犯连声说：“谢谢！”回来的路上，一边走一

边吃花生，大家非常高兴，都赞扬人民公社。就栽这些小松树来说，如果单干户，这个荒山就绿化不了，可是人民公社就办得到。我想，如有机会让我们多参加一些社会劳动，使我们能更多的接触社会，对我们的改造一定有促进作用。

这一天，回到所里已经上灯了。大家对这次劳动有一些反映，业杰强说：“我们这次协助人民公社栽树，是叫人民看看我们改造的情形，好特赦。”

我们这次到人民公社劳动，农民对我们反映很好，说我们栽得很快。有这样的评语不容易呀。

## 才放 10 个

过了秋天，到了冬天，暖气来了，外边下雪了。9月17日国家主席发布的特赦令，至今尚无消息，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死心。一天，在大俱乐部召开1所、3、4所的大组会，由金所长主持。他叫大家谈谈最近的思想。大家盼特赦，想特赦，是当时唯一的思想。会上首先发言的张普林说：“我这些日子就盼特赦，但是我又怕自己不够，心里很矛盾。”接着发言的是刘衍智，他说：“为什么还想特赦呢？这个思想在小组不是批判了吗？怎么还想它？我就不想，我想的是如何改造自己。”

肖抱愚接着说：“我现在考虑的是研究一种煤渣，如何能从煤渣里提炼出油来。我只想改造，没想特赦，赦不赦那是政府的问题。”

溥仪也发言了，他说他想特赦。

发言者多数想特赦，只有刘衍智、肖抱愚两人不想。大家发完言，金所长简单地说了一些话，大意是叫大家安心，不要浮动，尤其在劳动中不要思想溜号出了事故，又说：“想特赦也是必然的，不是

不应该想，应该想。但要想的全面一些，特赦的条件挺高，不是一般的条件，应从改恶从善这方面多想一些。”

回来之后，大家都认为刘衍智与肖抱愚在政府人员面前不暴露思想，说一些违心之论，言不由衷，改造不老实。

11月底，我们搞文娱的准备新年京剧节目。衣科员来了，对我们京剧组的人说：“不要赵金鹏唱京剧，叫他说 10 段山东快书吧！”赵金鹏一听 10 段山东快书！犯愁了。既然衣科员这样指示，就没有派赵金鹏的京剧角色，叫他专门搞山东快书，这在赵金鹏身上成了负担。

这时，犯人们又议论开了，有的人认为特赦这件事可能没有了。我把特赦令找出来仔细一研究，这是 1959 年的特赦令，是为了庆祝国庆 10 周年，对战争罪犯、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进行一次特赦。这事决不会跨年度，一定在年前特赦。一些看到特赦令的战犯都同意我的意见。我又一想，可以在 12 月 31 日举行特赦，与元旦联在一起，也很有意义。想得太多，也不考虑可能与否。我甚至想，1953 年判刑的时候我还很高兴，现在无所谓了。现在大家谈论的不是判刑的问题，是够不够 10 年，有一些人甚至认为 10 年不 10 年也没有关系，只要改恶从善就能特赦。至于什么是改恶从善呢？有人说：“政府说你改恶从善了，你就改恶从善了，政府要放你，你就改恶从善了。”

明明在特赦令<sup>②</sup>上面写着“关押已满 10 年，确已改恶从善。”但是我们不少人都不注意这些条文。认为规定是规定，最后还不是政府一句话。可谓利令智昏，因为自己的利益什么都不顾了。我也是这样的人，对于怎样才算改恶从善，我只认为出去不反动就行了。我的精神非常疲劳，如果特赦大会这样拖下去，一定有一些人要患病。政府怎么还不举行特赦大会啊？没有我也好，有我更好，快点过去，别这样拖。心神不安，什么也搞不好，尤其在电机厂掌握机器的战犯很容易发生事故。

11 月 30 日，下了一场大雪。12 月 1 日，发动我们扫雪，打扫监

号的卫生。12月2日接着扫雪。这次打扫与往常不同，要求彻底。可能要开特赦会吧？同时，也彻底地打扫了电机厂的卫生。3日这一天，一切场所都打扫干净了，大俱乐部装了许多电线，还有录音机、摄影机，大家知道这回一定要开特赦大会了。

3日下午，我在图书室写材料。我认为马上就要走了，这些材料是写台湾军统特务的，写一点，是一点。我写了一页多，金所长进来了，随后衣科员也来了。金所长问我：“写什么呢？”

“写材料。”

“等一会儿再写，先回去。”我出了这屋，衣科员叫来了杜聚政。金科长与杜聚政谈了20分钟，又把张普林找来，说了一会儿。

我分析这个时候金所长找他们两个一定与特赦有关。张普林还可以，杜聚政这个人改造得不好，经常吵吵闹闹，他是挨批评的对象。于是我走到杜聚政的窗前，偷偷地观察杜聚政的表情，一看，他擦眼泪呢！受了金所长的批评了？金所长很少批评人，方才说话的声音也不大，他怎么哭了？问题一定十分严重。但是看金所长的面部表情很平静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汽车拉来了许多长条凳，要举行会餐？许多布置都是围绕特赦大会的。个人有个人的想法，我想什么呢？我想，我是1948年10月自首的，到今天已经11年多了，明天是12月4日，1948年12月4日，我在长春公安局看守所被押时，一个朋友在这一天给我送来一些衣服、被子和现款，我老也不忘这一天，明天特赦大会也是12月4日，这一天我也不能忘记。真巧，都凑在一块了。晚上一切活动停止，既不学习，也不娱乐。夜里，胡思乱想，入睡很晚。

第二天起床后，传达换上新衣服。早饭后，集合到院子，白科长讲话，指示了一些入场的规矩，告诉前排椅子留出一排，喊到名字的人，到主席台施鞠躬礼接特赦通知书，然后站在第一排上，等到都喊完了名字再坐下等等。我听说只留一排椅子，心里便计算了：一个椅子坐4个人，4个椅子也不过16个人！人数这么少哇，我的心先凉了一半。

队伍整理好了，依次进入会场。这个场面在解放后第一次看到，这么些摄影记者，不停地闪着耀眼的灯光，我的心情紧张起来。不一会儿进来一些首长，我们站起来鼓掌，之后坐下，由金所长宣布特赦大会开始！念特赦战犯名单，发特赦通知书……一个又一个，我的心焦急万分，剩最后一个的时候，还没有绝望……都念完了，我怀疑还有没念到的！就这么几个？也太少了！念完了名字，我什么也不愿意听了。政府首长讲话，特赦的战犯讲话，留监改造的犯人讲话，马马虎虎听了一些。反正没有我，我听那些干什么？越听越失望。呵，杜聚政被特赦登台讲话了，这我才明白，昨天他为什么擦眼泪。张普森是代表留监战犯发言。一切都明白了。获特赦的还有赵金鹏、白玉昆、贺敏等人。

从大俱乐部回到监号。我们这屋业杰强被特赦，我们帮助他收拾东西，与他握手。我心想，人家走了，我在这泡吧，心情空虚得很，十分不高兴。同屋的人也都坐在自己床上默不作声。坐了一会儿，学委会找我，晚上演京剧欢送特赦的战犯。我心想，特赦没有我，还要演剧，为他入作嫁衣裳。唉，心里不是个滋味。演吧，找人布置，忙个不停。赵金鹏演《追韩信》。他来化妆，与我客气了一阵，我告诉他：“心情太激动，要静一静，不要忘了台词！”

“没关系，忘不了。”

一切准备好了。前边是一些小节目，后面就是《追韩信》。我把场。赵金鹏一上场，台下一阵鼓掌，他紧张了。他本来是名老演员，今天也显得发呆，唱那大段流水的时候，掉了一段词。赵金鹏在台上演戏，李科员拿照相机在旁边照相。我心想，特赦的人一举一动都为大家所注意。人家怎么改造的？有的人，如杜聚政也看不出来有什么优点？我心内不服。

演完了戏，回号休息。第二天又开送别会，唐曦讲了临别赠言，溥仪也讲了话，大家拥抱欢呼。散会回来，就结束了。

12月5日下午开始漫谈，别人暴露了不平不满，我暴露了灰心失望。许多人认为这回完了，十年八年才有这么一次特赦，还未

轮到自己，有人说：“才放 10 个，太少了。”

“什么改恶从善，政府说了算！”

“这回是放杂牌的，不放中央的，周震东、赵金鹏、杜聚政、白玉昆，都不是中央系的。不放特务，一个军统、中统都没有。”反正从鸡蛋里挑骨头，各式各样的思想都涌现出来。

如此混乱了几天，大约 12 月 10 日，金所长做大报告，主要讲特赦问题。讲了改恶从善的标准，也谈了溥仪的问题。他说：“溥仪根除了封建主义的思想，有一次他的家人来看他，仍称他为‘圣上’，被溥仪批评了，这说明他对过去的称呼感到可耻。”金所长又说，“—所有说自己没有当皇帝的思想，当然你没有，你也不会有，具体人具体要求，要求溥仪的就是这个。还有一次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到这来采访，与溥仪见了面，他们想从溥仪嘴里得到一些东西，但是什么也没有得到，他们很失望地走了……这些都说明溥仪的立场坚定，改造好了。”

接着金所长说：“你们有的人，改造也不错，但是有血债和罪恶，人民不同意，这就不能特赦，这就要求你们更加努力改造，政府再向人民做说服工作。我建议你们，应当时刻站在被害者的立场来认罪，如果你们的亲人被杀，你们该怎么想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，始终是想不通的。认为特赦没有你，你就抵触，这样对待特赦是不正确的。”最后，金所长说，“你们已经有十年的改造基础，每人都有改造的成绩，在这个基础上再提高一步，把错误的思想埋葬掉，好好改造，希望很大。”

我们根据金所长的报告，漫谈了三天，我想通了。首先考虑到自己没有改恶从善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，又过低估计了别人，这就产生了不服气的思想；再者，从认罪上来说，长春人民对我恨之入骨，我真改造好了，也要对人民进行说服；同时，从被害者的立场来认罪，将心比心，如果我的亲人被杀，我一样地痛恨刽子手……再回忆参观东北烈士馆的情形，于是我的头脑冷静了，抵触的情绪渐渐地消退了。

我在小组会上发言：“说来说去，就是一句话，没有特赦到我的头上，我就不满意，别的话都是其次。特赦战犯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而我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看待这件事情，既狭隘又片面，说明自己观察问题的水平很低，说明改造的程度很差。我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对战犯的特赦，特赦是对所有战犯的宽大与鼓励，不是对哪一个人的问题，我们都应当感恩。”

尚传道说：“我认为最近还会有特赦，因为这是第一批，既有第一批，就有第二批。我看第二批不会很远，第二批的人数还要比第一批多。”

我知道这种想法很难实现，但我不反对。在我的思想深处，还是对改恶从善这个标准模糊。究竟怎样算改恶从善呢？又不能用秤称，用尺量，还不是政府一句话。有的战犯说：“政府掌握的材料，咱们怎么会知道？特赦人的优点，咱们知道吗？”“不知道，我们向特赦的人学习什么呢？”也有这样的反问。接着就有这种说法：“特赦的人有政治作用，伪满最大的是溥仪，国民党最大的是杜聿明。这也巧了，他们反动职位高，改造的也都好，内中不是政治作用是什么？溥仪改造是不错，我们看见了，是不是一所就没有比溥仪再好的了？也不见得。”

张三民对我说：“特赦大会前，我们那组以为你有十分希望，给你打了保票。特赦大会之后，我们对这件事进行了检查，检讨看问题不全面，看现象，不看本质，唯心、武断等等。因为你，我们增加了这么些事情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这些人看问题，唯物、正确那才是怪事呢？在改造中不可免的要有这些问题。”

特赦大会的余波，残存的反映，有时还会在某些战犯，某些场合流露出来。

一天，金所长告诉我们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，特赦回广州的业杰强<sup>③</sup>又返回来了。原因是业杰强杀过一个姓曾的亲人，这回听说业杰强特赦，姓曾的要找业杰强算帐。业杰强在广州与家中联络，

他老婆告诉他，千万不要回家。走投无路，他便再一次求助战犯管理所。

①北院：指与抚顺战犯管理所一墙之隔的普通监狱。

②特赦令：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。最高人民法院12月4日特赦释放首批战犯33名。特赦令第1条：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，关押已满10年，确已改恶从善，予以特赦释放。

③业杰强：原国民党第72军233师698团上校团长。业特赦未能回故里，返战犯管理所后，先后与一批特赦人员在凌源矿山机械厂、营口新生农场劳动。1966年初安排回乡就业。